

[編者按]2014年3月28日，澳門大學榮譽博士、2001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約瑟夫·斯蒂格利茨教授應邀在澳門大學文化中心以“不公平的代價”為主題發表講演，着重解析社會不公平現象背後的種種因果並反思全球化與自由市場的優劣利弊，聽眾反響熱烈。本刊編者在徵得講演者的同意後，將翻譯的中文稿摘編如下。為了與講演者以往的“不平等的代價”系列講演相區別，編者根據講演內容重新製作了標題。

不公平現象的因果及其消解

——美國對中國的鏡鑒

[美國]約瑟夫·斯蒂格利茨
(哥倫比亞大學，美國 紐約 10025)



[摘要]社會的不公平現象和貧富懸殊問題在世界各地普遍存在着。這些不公平現象包括人們在收入、財富、醫療、教育、司法救助等等方面之權利。研究數據顯示，過去數年間，富人的收入和財富增長速度相當驚人，絕大部分的經濟增長成果祇有富人纔能分享。每一個不公平現象背後都有其原因，但離不開社會的歧視、不健全的制度、法律的不完善和全球化等因素。一個社會不公平情況越嚴重，對這個社會的經濟發展也就越不利。國民生產總值(GDP)並不是衡量經濟發展的唯一指標，不應盲目追求數字的成長，更應關注有多少人能實際分享成果，因為社會的穩定與公平是環環相扣的。儘管我們不可能消除所有的不公平現象，但我們必須要找出那些導致不公平的源頭，在制定政策時多從這些方面考慮。因為，這會真正改變我們的社會。孩子不能夠選擇自己的父母是事實，但作為社會，它可以打造一個公平的平臺，使每一個年輕人都有機會充分發揮他的潛能。這應該是我們追求的目標。

[關鍵詞]不公平 原因 後果 補救辦法

[作者簡介]約瑟夫·斯蒂格利茨(1943—)，生於美國印第安納州加里市，1967年獲得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博士學位，先後執教於耶魯大學(1970—1974)、斯坦福大學(1974—1976, 1988—2001)、牛津大學(1976—1979)、普林斯頓大學(1979—1988)、哥倫比亞大學(2001年至今)。1979年獲得美國經濟學會“約翰·貝茨·克拉克獎”(John Bates Clark Medal)，1988年當選為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1995年擔任克林頓政府的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1997年任世界銀行高級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2001年因創立信息經濟學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現任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聯合國國際貨幣金融體系改革專家委員會主席；主要從事公共部門經濟學特別是競爭過程中的不完全信息和昂貴信息的作用研究，代表性著作有*Freefall: America, Free Markets and the Sinking of the World Economy*、*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Making Globalization Work*、*The Price of Inequality: How Today's Divided Society Endangers Our Future*等。

Title: The Price of Inequality

Abstract: Inequality and disparity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are common all over the world. Inequality is a problem not only with regard to people's incomes, but it has also inflicted their access to healthcare, education and judicial assistance. Research data shows that in the past few years, the wealth among the rich has increased drastically, and that they have benefited from the majority of economic growth. There are reasons behind the preponderance of inequality, which can be located in social discrimination, deficiency of the system, imperfection of the law and effects of globalization. The more severe inequality in a country, the more detrimental it is to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a society. The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is not the sole indicator to measure economic development. As social stability and fairness are closely interlinked, we should not blindly pursue the increase in numbers, but rather we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actual number of people who are able to enjoy the fruits of these growths. In spite of the fact that it is impossible to eliminate all unfairness, it is necessary to uncover the source(s) causing this phenomenon in order to improve our society. There is no doubt that children are not able to choose the socioeconomic strata into which they are born, however, society can maintain a fair platform where every child has the opportunity to realize his or her potential. This should be our ultimate goal.

Keywords: inequality, cause, consequence, remedy

Author: Joseph E. Stiglitz is University Professor at Columbia University, the winner of the 2001 Nobel Memorial Prize in Economics, and a lead author of the 1995 IPCC report, which shared the 2007 Nobel Peace Prize. He was chairman of the U.S. 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ors under President Clinton and chief economist and senior vice president of the World Bank for 1997-2000. Stiglitz received the John Bates Clark Medal, awarded annually to the American economist under 40 who has made the most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the subject. He was a Fulbright Scholar at Cambridge University, held the Drummond Professorship at All Souls College Oxford, and has also taught at M.I.T, Yale, Stanford, and Princeton.

我非常高興能够再次回到這個地方，上一次來是十二年前了。其實，我已是第四次來澳門了。我第一次來澳門是20世紀90年代初期。那時，我做了一個研究項目，是世界銀行（WBG）一個關於“東亞奇蹟”的研究。然後，我到了珠江三角洲，看了那個地方的發展。在過去的二十五年，珠江三角洲的發展可以說是一個奇蹟；而且，當我們二十五年後看到這個地方在這麼短的時間裏有如此大的進步，真是非常了不起。當然，在世界的其他地方，也有很多的事情在發生、在變化，其中一個就是我接下來要講的題目的內容——不公平的現象的增加。這種現象在世界的各個地方都在發生，包括美國、中國，都有這樣的情況。我今天想要說的是：這樣的不公平到底是什麼原因造成的？會有什麼樣的後果？補救的方法有哪些？

一、不公平現象的本質是什麼

關於不公平現象，其實在大多數的國家都在發生着，祇不過，不同的國家的不公平表現是不一樣的。有學者說，不公平現象的發生是全球化所造成的、是全球化經濟的影響造成的；但是，經濟的這個力量可以說在全球是一樣的，而結果卻是不一樣的，對人的影響也是不一樣的。所以，這個問題並不僅僅是經濟的問題，其實它是跟政策有關的，而這個政策又是由政治所決定的。所以，現在我們講不公平的現象的時候，是不能夠忽略政治與政策在這其中所扮演的角色。

我之所以說不公平的現象在全球都在增加，是因為在過去幾年，這個“不平等”變得越來越糟糕。隨着全球經濟危機的爆發，這個不公平的現象在已經發達的國家變得尤其嚴重了。可以說，這些發達國家貧窮的人、在社會底層的人，他們所遭受的痛苦是幾倍的增長。在歐洲，現在平均的失業率是12%，但具體到葡萄牙、愛爾蘭、西班牙，他們受到的壓力更大——失業率達到25%。對於你們在座的來說，如果讓你們面對失業，會是什麼反應呢？而在西班牙，過去的四年，年輕人的失業率曾達到50%甚至60%。雖然不同的國家的人們的生活方式是不一樣的，但如果三十歲的年輕人大多數還在跟他們的父母在一起生活（當然，做父母的是希望見到

孩子的次數越多越好，但現在父母親卻希望長大成人的孩子見得越少越好），可以說這不是一個好現象，也不是一個好的社會現象。他們之所以要跟父母住在一起，是因為他們沒有工作或者他們收入很低。這依然還是政治與政策怎樣去面對經濟危機的問題。

在美國，我們可以看到，事情變得越來越糟。金融危機爆發以後，也就是在2009—2012年，收入增加的95%都被最富有的1%的人拿走了，而生活在底層的人根本就沒有感覺到經濟復蘇的迹象。有學者說，經濟衰退已經過去了。可是如果你把這話跟大多數的人說，他們都會笑，說你說的一定不是我們，因為我們根本沒有感覺到。我們再看一看財富的中間層——中產階級的財富，他們的財富已經下跌了40%，又回到20世紀90年代初期的水平。在美國，總的來看，又回到了1989年的水平，那是超過四分之一個世紀以前的水平。如果說你是一個全職的男性的勞動者，那情況更加糟糕了（當然，美國人口分佈每個地方都不一樣，我這裏說的是基本上），他的收入已經降到了四十年前的水平。“四十年前”是個什麼概念？那是中國還沒有開始改革開放，還沒有開始它了不起的發展之前。中國在三十年前纔開始了市場經濟，可以說從那個時候起，中國經濟發展的收入翻了八番。但是，在美國，卻是走着相反的方向。

當然，這並不是說，中國所發生的巨大變化對於“不平等”是具有免疫力的。我特別想提到兩個方面：一個方面是三十五年前的中國或者四十年前的中國，當時那可以說是一個平均主義的國家；但現在，中國的收入的不平等如果用“基尼系數”(Gini coefficient)來表示的話，基本上快跟美國差不多了。所以，中國在過去三十五年的發展，不僅僅是經濟發展了，它的不平等也在增長。這跟其他國家是一樣的。發達國家不平等的增加通常都會經歷這樣一個過程，就是某些人他們富得比其他人更快。而中國，由於東部的發展要比西部快，城市的發展要比農村快，所以，在發展的初期往往都會是這樣的，這並不等於說永遠都會是這樣。儘管在一些東亞國家，在它們發展得很快的時候，即我們所說的那個“東亞奇蹟”，確實有的國家在經濟增長的同時不平等並未同時增長。但是，中國作為一個大國，它的不同地方的發展會是不均衡的，這個也是可以理解的。不過，中國的不平等的增長也的確到了一個需要關注的水平了。

另外一方面，如果說中國的不平等問題在“新興市場”(Emerged Markets)國家當中還不是最嚴重的，在發展中國家裏面也不是最嚴重的，那你看一看巴西。巴西因為關注到這個不平等的問題，所以在卡多佐(F. H. S. Cardoso)任總統期間(1995—2003)就開始處理這個問題。他們在教育、醫療等方面的投入很多，還有給年輕人更多的機會等等，所以在一個比較短的時間裏面就有效降低了這個不平等。再看中國，經濟增長得很快，每一個人分享了經濟增長的成果，有數以百萬計的人脫離了貧困，這在世界上來說都是一個奇蹟。但是，某些人比別的人、比其他的人，他們的得益更多，他們收入的增長——頂層的人比那個底層的人的增長是雙倍的。中國最富有的1%的人的收入份額發展太快，1996—2008年，作為衡量收入不平等現象的基尼系數從0.3上升到了0.5，那基本上就是美國的水平了，可美國畢竟是發達國家啊！好消息就是，最近幾年，這個情況在中國已有了改善。

講到不平等，除了收入的不平等、財富的不平等之外，那還有其他方面的不平等也是非常重要的，我們必須要重視這個問題，找到解決的方案。例如，保健問題，即環境污染給人們健康造成的影響；還有，司法公正與收入、財富也有關係。

先說醫療保健系統。收入、財富的不平等，其結果會變成醫療保健方面的不平等。美國可以說在發達國家裏面是收入、財富最不平等的國家，這個在醫療保健方面馬上就反映出來。由於這個不平等在醫療保健方面非常突出，人們的健康也因此反映了出來——在美國，一些生活在底層的群體，他們的人均壽命是很低的。在中國，到底是想要一個什麼樣的醫療



保健體系有着很多的討論。有一些學者主張，讓市場去主導一切。理由是，既然由市場經濟去主導經濟的發展，醫療保健也應該像是做其他商品那樣由市場去主導。但是，我可以說，如果醫療保健方面你讓民營經濟去主導、由市場經濟去主導，得到的後果就像美國現在這樣。在醫療保健方面，政府必須要扮演主導的角色纔行。收入並不等於是財富，在美國，財富的不平等可以說比那個收入不平等更加嚴重。例如，有一個家族企業，他們擁有的財富等於美國底層的人30%的收入，但他們的做法可以說是惡名遠播，他們不給他們的員工適當的醫療福利。但是在巴西，他們表示，他們可以去處理這種事情，可以做到美國所做不到的事情。在印度，也有類似的討論。印度有一些人相信，他們知道很多企業家如何去做生意——找美國的公司教他們怎麼樣去做零售業，說可以學習怎麼樣去貪污。所以，是不是什麼都要跟美國學，值得討論。美國這四十年發展的結果是，中層的人越來越少，低層的人越來越多。本來中層的人——中產階級是有生命力的社會的基礎，可以說大多數人是有動力的，結果現在是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到貧窮的行列中，四個人之中就有一個是在貧困之中生活。我們的總統也在講這個問題，貧困在美國是在增加，而在中國是不斷地使數以百萬的人脫貧。所以，如果這個情況持續下去的話，美國還有什麼希望呢？現在這個不平等是方方面面的，我們不必去強調不平等的複雜性，也不可以用某一個數字去概括。我們可以看到，在大多數國家，這個情況是在不斷惡化的。例如，在歐洲正在進行的經濟衰退；在德國，它自2007年以來，增長率祇是1%，但這還不是最失敗的。德國算得上是歐洲比較公平的國家了，但它那個底層的30%的人可支配的收入也不斷在減少。

接下來講機會的不公平。這個機會的平等，可以說比那個結果更重要。美國人曾經以為他們生活在充滿機會的國家，認為人在美國通過努力等等就可以有機會從底層流動到上層。在美國，確實有很多這樣的例子。但是，為什麼我們會去講這些故事、會描述這些故事呢？那是因為他們是極少數。如果是普遍現象，那就沒什麼好描述的了。所以，到底一個國家是不是真的有平等的機會，那個幾率到底有多大？我們要看數據。美國跟其他國家比較是不是真的有更加平等的機會呢？可以說，情況正好是相反的。如果你跟其他發達的國家比較的話（絕對要去衡量是不容易的），有一個很簡單的方法：我們可以看看收入跟一個孩子的父母所接受的教育之間的關係是什麼？數據顯示，美國的年輕人，他們的收入、他們所受的教育，是跟他們父母所得到的收入成正比的。這要比其他的發達國家突出得多。所以，在美國，一個孩子到底能不能夠成功，在於他有沒有成功的父母；如果他沒有成功的父母的話，他的基本機會是很少的，還不如放棄好了。而這樣一個機會的平等，那肯定也會影響到人們對美國經濟模式的反思：我們到底是不是真的要學習呢？在其他的發達國家，也會受到同樣的影響——全球化的影響。但是，我們看北歐的國家——斯堪的納維亞半島上的這些國家，因為他們做出了政治、政策上的選擇，所以，結果他們有更加平等的機會，不公平的現象也可以得到緩解。我在過去幾年所做的研究，相當有趣的一方面就是去瞭解機會的平等跟結果的平等，可以說這方面的關係是很大的。所以，機會的平等就影響到結果——收入、財富的平等。如果我們看不同的國家的情況，那肯定是很難說明問題的；但如果你祇看美國，那是很可以說明問題的。機會越不平等，收入、財富的不平等就越嚴重。

二、不公平原因的背後

造成不公平的原因有很多。例如，最富有的人拿了很多的份額，使得中層與底層的人得到的東西更少。由於時間有限，我這裏祇講幾個主要原因。可以說，它們基本上是相互關連的。一是工會的削弱。那些取得更高平等的國家，比如說北歐的國家，那裏的工會發揮作用

是一個原因。二是社會的傳統、社會的習慣。比如說，在婚姻方面，婚姻的增加使得不平等也增加。三是司法的制度。那個司法制度裏面，不僅僅是影響到經濟的效益，也影響到不平等。四是公平競爭的環境。例如，如果有不適當的《企業法》，結果那個企業的總裁就會得到大部分的收益。在某些國家，總裁的收入是一個普通勞動者收入的十倍；在美國，過去大概是三十倍，現在竟然有企業的總裁比他們員工的平均收入多一千倍。如果你說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那個頂層的人——富人的財富向貧窮的人那裏流動，那就好了。但是，事實上並不是那樣的。他們並沒有把餅做大，祇是把餅的更大的一部分拿走了。再如，金融業的規範問題。希望中國的金融業不要像美國的金融業那樣，發行相當多的信用卡等等，結果他們便琢磨怎麼樣去操縱市場。可以說，那些做法都是掠奪性的。它們並不會增加經濟效益，祇會使不公平的現象更加嚴重。

這裏我以《破產法》為例，重點講一講法律它到底怎麼樣的不公平。《破產法》是什麼呢？當一個人，他不能夠還債的時候，他就宣佈破產。在大多數的發達國家，當一個公司破產的時候，如果把資產變賣以後，誰應該優先得到錢呢？是它的員工。大多數文明的國家都應該這麼做。但在美國，一旦一個公司破產的時候，變賣資產、清盤以後，什麼人先得到錢呢？是銀行，然後是它的總裁。經濟衰退以後，美國有那麼多企業倒閉，都需要政府出手去救它們，結果，數百萬億美元的錢就這樣流動到這些的人手裏了。你說，這是一個有規範的市場嗎？我們再看《破產法》的另一面。如果學生——因為現在學費相當地高，而人們的收入又低，所以學生有學生貸款，但學生貸款——哪怕在破產的情況下，它也不能夠被豁免，遲早是要還的。那結果呢，有時候就由他們的父母去承受——哪怕這個學生不幸死亡等等，他的父母也是要去償還他的學生貸款的。所以，你看這樣的《破產法》有什麼公平可言呢？我可以說，這個《破產法》僅僅是其他種種中的一種。所以，這個所謂市場主導的經濟，我們要看是什麼樣的市場主導的經濟。我們必須要記得，在市場經濟的同時，我們要看社會後果。

當然，整個社會的、經濟的各個方面，都會跟這個不平等有關。關於宏觀的經濟政策，其實基本的目標本來應該是削減失業率，然後降低通貨膨脹。但這裏面有兩個很重要的問題值得討論：第一個問題就是科技進步與失業率的關係。科技的進步，確實使那些有技術的人受益。在全球化形勢下，隨着技術方面的發展，美國的工人要跟世界其他地方的工人去競爭，就要鼓勵他們去創新、發明。但現實情況是，美國有很多非技術性的工人失業，失業率很高。所以，我們應該怎麼樣創新，使得這些非技術的工人可以得到工作的機會。現在的悖論是，我們不斷去創造一些昂貴的機器去取代這些非技術的工人。我們為什麼要做這樣的發明呢？我們為什麼不在環保方面做更多的發明，在更加有效使用環境資源方面去做創造呢？所以，我們所做的一些創造發明其實是扭曲了我們這個經濟基礎的。這些可以說是有錯的創造發明——增加失業率。再加上一些新的貿易協議，比如說“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TPP），都會使得這個問題更加的嚴重。

第二個問題，也是最關鍵的問題，就是經濟理論在創造不平等。關於不平等的問題，在過去兩百年裏一直都被關注。由於市場經濟在當中扮演着相當大的角色，市場經濟的發展也使得人們嘗試給這個不平等找出理由。有學者說，這個不平等其實是好事，因為它可以刺激生產力。你們在座的很多人在學經濟學的時候可能從課本上學到過所謂的“邊際生產力理論”（Theory of Marginal Productivity）。這個理論就說，一些對社會貢獻大的人，他們是得到了很多，而且他們應該得到的更多；這個收入的不平均，是因為他們做出的貢獻不一樣，對社會的貢獻不一樣。那如果最富有的1%的人真的對這個社會做出那麼大的貢獻，我們都應

該從中得益啊？因為他們對社會做了貢獻，整個社會都應該得益啊？但事實上並不是那麼回事。這個最富有的1%的人，他們對社會做出的貢獻其實是很小的。如果我們看這個經濟大衰退，到底是什麼人是造成了大衰退呢？是那些銀行家、投機者。到底是哪些銀行家啊？是那些銀行家的領導者，他們使我們走向了經濟的大衰退。結果，政府還要用很多的錢去救這些銀行，而它們卻對社會造成的是負面的影響。哪怕是在大衰退的時候，他們還是得到數以百萬、千萬元計的獎金。現在有很多銀行不敢再說是獎金了，他們改做叫“保持（獎）金”而不是“業績獎金”了，因為他們沒有業績可言了。你看那個世界最富有的一百人裏面，其中並沒有那些轉變社會、轉變人類社會文明的人，沒有哪一個去解碼脫氧核糖核酸（DNA）的人，沒有去發現激光、發現光纖的人，或者去建立現代醫學的人。他們是些什麼人呢？大部分是通過金融業剝削他人的人。他們當然可以說是成功的，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他們確是成功的。但是，他們並沒有給社會做出有價值的貢獻。所以，這個“邊際生產力理論”不過是給這個不平等現象尋找藉口罷了。按照這個理論，那些最頂層的人富有起來，每個人都會得益，最終還是會對社會做貢獻，錢會向窮人流動；那麼，現在經濟大衰退以後，美國政府向那個頂層的人傾注了那麼多的錢，應該所有人都得益啊？但情況並不是這樣。美國的中產階級，可以說這四十年的收入是停滯不前的。如果講到中產階級的發展，那個“邊際生產力理論”是不成立的。

如果我們從經濟學上來解釋這個現象，它是什麼呢？它叫做“尋租”（Rent-seeking）行為。我們可以以那個石油的富國做例子。他們錢怎麼來的呢？他們的競爭就是看什麼人可以從那裏得到石油，其實它們國家的經濟並不好。但中國，其實是一個資源貧乏的國家，却居然做得那麼好。如果我們仔細觀察，很多的社會其實都變成了尋租的社會、尋租的經濟。有一個理論說，財富的創造就是把那個餅做得越來越大。但在尋租經濟裏面，那些富有的人，他們並不是把那個餅做大，而是把那個餅更大的一塊兒拿走，使別人得到的更少。他們的財富是通過“尋租”行為得到的，而不是通過對財富的創造，他們沒有創造財富。我說的這些“尋租”的人，他們其實還不是最富有的人。那麼，如果我們對這些富人增加稅收又會怎麼樣呢？按照一些人的理論，如果真的那樣做的話，他們可能連“尋租”這樣的事都不做啦。但很多國家做了這樣的實驗，就是向富人增稅。結果，那些對富人增稅的國家的經濟並沒有衰退。所以，我們可以說，當他們連“尋租”行為都不做的時候，他們的國家經濟並不是在衰退。

三、不公平的後果與補救之道

不公平將會導致什麼樣的後果呢？首先，它會降低政府的可信度或信任度。現在一些經濟學理論居然說，那個不平等是應該的。我說，不平等的收入、不平等的財富是不公平的，那是沒有什麼藉口可以去解釋的。那些不平等的國家，包括機會不平等的國家，它們都為這個不平等付出了很大的代價。當然，我們都知道不平等肯定不是好事，但如果我們要去處理、解決這些不平等的現象，也是要付出很大的代價的，我們能不能夠承擔。有的人擔心，如同把那個會生金蛋的鵝殺掉那樣，會使得經濟的發展減慢。結果呢，還是不要去處理這個不平等的問題了。美國的一個總統候選人就很明確地說：我們根本不應該去講不平等這個問題。對於不公平的現象，我們祇能够關起門來悄悄說。這個人，儘管他的收入以百萬計，但他祇付15%的收入稅，他很多的錢是放在那個避稅天堂——開曼群島(Cayman Island)的。他把錢放在那裏並不是因為那裏陽光特別充足，而是為了逃稅。所以，我們要建立更加公平的社會，而不是平均主義。建立更公平的社會的根本是機會更加平等，而機會更加平等的結果就會有更加强大的經濟。我在幾年前提出這個觀點的時候，很多人覺得是一個極端的看法，但現在越來越多的人同

意我的看法（這並不僅僅是左傾團體的看法），越來越成為主流的看法了

其次，不平等對經濟發展是不利的。上個週末，我在北京出席“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4”，聽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的一個演講。她的演講跟我這個觀點是很相近的。她同意，不平等的情況越嚴重，對經濟發展越不利。所以，中國必須要關注這個現象，要正視這個不平等的問題。因為，不平等不利於經濟發展，它們都是互相關聯的。這其中一個，就是醫療的不公平。在美國，收入的不公平導致了美國醫療質量的下降。如果你有一個勞動力市場，一個勞動者如果不健康的話，他的生產力一定是不高的，也不可能是有創造力的。因為，如果醫療條件不好的話，將使得這個人無法充分發揮他的潛能。另外一個，就是機會的缺乏。就是說，我們並沒有完全充分地利用人力資源——貧窮的孩子他們並沒有充分發揮他們的潛能。根據“尋租”理論，人們並不是在創造財富，而是在力圖取得最大份額的現有財富。其中一個很重要的現象就是壟斷。“壟斷”其實並沒有去擴大這個財富的份額，它因此也就損害了經濟的有效發展。

其實，我們可以有更多的發展、更多的穩定，以及更多的平等，並不是一定要有一個折中。不平等、不穩定將會付出很大的代價，也會是一個惡性的循環。許多政治都證明了不平等與不穩定兩者之間的關係。在金融危機發生之前的幾年，美國的不平等已達到一個很嚴重的程度，位於底層的那些人，他們的儲蓄已經到了很低的水平。由於他們的收入低，也使得整個需求的基礎被削弱了，結果生產力也在降低。其實，泡沫在經濟大衰退之前就已出現了，政府不斷做的就是把那個泡沫吹大——通過投入很多的錢等；但是這種花費是不可持續的，因為沒有一個泡沫是永遠不破的。終於，這個泡沫爆破了，那結果肯定是災難性的了。例如，房屋市場的崩潰，等等。所以，這個可以告訴我們：不平等是終於會形成經濟衰退的，不平等又是跟經濟的負面表現相關聯的。那麼，到底對公共基礎設施的投入怎麼樣纔可以刺激經濟呢？我可以說，政治的角色肯定是有，包括建立一個合理的司法制度。對公共基礎設施的投入，包括交通、教育等，這些公共投資的回報率都是很高的。但是，現在對技術的投入、技術發展的投入比其他的公共投入要多得多。在美國，現在經濟大衰退以後，與其去增加那些方面，還不如增加交通、教育方面的投入。現在走的卻是相反的道路，是削減那方面的投入。在此，我想再重申我之前說的，一個正面的、好的司法制度，應該是促進平等機會，最終是會刺激經濟的增長的。我們必須要考慮到，一個國家的成功並不僅僅是用國民生產收入總值（GDP）去衡量的。美國的“GDP”是不斷在增加的，但大多數的人的收入卻是停滯不前的。在我所在的一個專家委員會——“經濟表現與社會進步國際評估委員會”裏面，大家都認為，所有社會的穩定都是與社會的公平相關聯的。如果你這一步做錯了，以後都會是錯的。所以，我希望中國在制定有關政策的時候，要考慮到這個方面。

消解這個不公平的現象，我們可以從兩個方面去着眼：一個我們要看，在增稅以前的那個收入的分佈，我們應該做些什麼。我可以說，教育是佔最重要地位、舉足輕重、極為關鍵的，所以，投入教育。另外一個要看，在增稅以後的財務分佈，那就是有一個更加好的稅務制度。在中國，現在的稅收制度有一些好的方面，包括資本收入稅、環境稅等，還有對環境保護的投入等，這可以說對所有人都有利——不管是富有的人還是貧窮的人，都可以從環保中獲益。而在美國，不是去增加資本收入稅，卻是對其他方面去增稅。所以，最富有的人付的稅比一般的勞動者付的稅要少。這不僅會增加不公平的現象，同時也扭曲了經濟。你對那個投機的行為、對投機者不去增稅，結果就會使更多的人去進行投機而不去勞動。在美國，越來越多的年輕人不去做真正生產的事情，他們去進行投機，因為美國整個的稅制、整個的司法制度都是鼓勵投機行為的。結果就造成更多的不平等，也扭曲了美國的經濟。

對於如何消解這個不公平的現象，我祇有全面的或全域的計劃，沒有什麼靈丹妙藥。因為，許多問題如貧窮問題是長久積累下來的，不可能一下子完全的消除。但是，可以在某些方面解決那些迫切需要解決的。例如，增加機會的平等，對教育投入，徵收遺產稅，推動全民就業，然後解決這個緊縮制度、緊縮政策。我這裏說的不僅僅是經濟。中國在向市場經濟成功的例子學習，但“GDP”並不是一個好的指標。中國在進入市場經濟發展的同時，肯定有很多問題要面對。例如，我們需要什麼樣的醫療保健制度，到底是參照歐洲的模式，還是參照美國的模式？又如，我們需要怎麼樣的教育制度？以保證更加多的平等的機會。如果不公平，所帶來的風險不僅會降低信任，而且也會減弱中國現在成功的持續性。總的來說，越平等，就會有越多的增長。

謝謝！



澳門大學趙偉校長（右）向講演者贈送紀念品



講演會場剪影

附：回答聽眾提出的問題

問題一：人們傾向於認為，不平等會導致更多的犯罪率。但是，現實卻是相反的。你對此有什麼解釋呢？

答：犯罪是有很多因素共同影響的。我個人認為，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條件下，不平等確是能造成更多犯罪。比如，在美國，就有很高的犯罪率。但是，在其他一些國家，其實最富有的1%的人感覺生活也不快樂。其中一個決定性因素就是8—35歲之間的年輕男性有很高的犯罪率。人口的變化，對犯罪率也是有影響的。所以，人口的構成是很重要的。關於美國犯罪率的下降，我覺得是有其他因素的作用。美國的不平等另外一個顯著特點，就是種族間的不平等。美國人口佔世界5%，但是它在監獄裏的人口就佔世界20%。所以，我的觀點是，即使沒有這個犯罪率的問題，美國這個制度也是失敗的。謝謝！

問題二：從去年開始，越來越多的人說，經濟在衰退；但是，今年有很多的國家如巴西、中國等，經濟卻在復蘇。現在，俄羅斯正在受到歐盟的經濟制裁。你對“金磚四國”（BRIC，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經濟的發展前景怎麼看？它們對全球經濟會有什麼影響呢？

答：“金磚四國”可以說是一個相當成功的例子。我們不應該僅僅看每年的上下波動。短期的一些影響、短暫的衰退，有時候可能是政治上的，或是其他一些原因。但總的情況是，近年來中國的經濟增長、印度的經濟增長，那是四十年前任何人都不能夠想象到的。那怕中國的經濟增長在減慢，7%的年增長率還是很高的。但如果是四十年前，7%的年增長率是不可想象的。每隔十年，中國的經濟就翻一番，是很了不起的。我想，中國哪怕是它的經濟增速減慢，但如果它在平等方面做更多的事情，環保方面做更多的事情，還是成功的。印度已經很多年保持7%—9%的經濟增長，最近回落到百分之四五了，但據說現在又復蘇了。至於巴西，還有一些非洲國家如南非，它們的經濟都是一些外向型的經濟，受制於外在的環境。比如說，一

且中國經濟發展放緩，巴西向中國的出口就會受到一定的影響。當然，它們還會受全球經濟上下波動的影響，特別是美國經濟的影響。全球的金融市場也是很不穩定的。一些“新興市場”國家，面對這樣的不穩定，也是相當辛苦的。至於中國面對這樣的資本市場，這個外來的不確定因素是相當多的。俄羅斯則是一個特別的例子。在過去的二十五年，它在經歷一個“去工業化”的過程。這跟中國正好相反。你看，它出口的基本上都是天然資源。如果要靠自然資源去獲取經濟增長的話，那是一個被詛咒的經濟。俄羅斯就是這樣一個情況。一個正面的經濟形象，應該是通過法治，通過對更多個人的保障等等。這纔是可持續的經濟。可以說，中國是往那個方向走的，印度也是，但俄羅斯走的是相反的路子。你說歐洲、美國對它做的經濟制裁，並不會對它這方面造成扭轉。俄羅斯依然是依靠自然資源的一個經濟。如果一個國家制裁它、不買它的自然資源，它可以向別的國家賣。比如說，歐洲對俄羅斯的天然氣依賴很多，可能短期來說會對天然氣的價格構成不穩定，但不是長期的。

問題三：你對美國所實行的“量化寬鬆”（Quantitative Easing）貨幣政策有什麼看法？

答：可以說，2008年開始一些的做法、一些干預，都以為市場會做自我調整，事實證明都是錯的。你也許說這是經濟科學，但其實都是華爾街的看法。而美國的中央銀行完全被華爾街牽着鼻子走了。結果，造成一系列的政策失誤，使得泡沫不斷地膨脹，然後終於爆破。到底該怎麼辦呢？政府覺得，我們不能什麼也不做，不能顯得我們什麼用也沒有吧？就把利息降為幾乎是零，然後發行很多長期債券。結果當然有一點點幫助了，但其實效果並不大。因為“量化寬鬆”所創造的熱錢並沒有投到應該投的地方。本來的目的是，希望中小企業可以藉機借貸，但銀行對中小企業借錢有着太多的條件。美國在做“量化寬鬆”事情的時候，沒有考慮應該怎樣調整美國的經濟，怎樣調整美國的金融。結果現實中，對中小企業的借貸比經濟大衰退之前還要減低了20%，把熱錢放到流動系統裏面了。現在美國政府依然在放貸，但很多這樣的錢往哪兒去了呢？它流向新興經濟體，去炒熱那裏的經濟，而並沒有流向美國本身的企業。美國經濟是在恢復，但還沒有恢復到可以創造足夠就業率的水平。但結果它炒熱了全球的市場，因為錢跑去投機去了。由於“新興市場”的機制包括政治並不完善，而且也不穩定，它們在面對這樣的熱錢的時候，其實也會遇到問題的。自身的財政儲備既不完善又不充足，面對這麼多熱錢的時候會對自身系統造成損害的。目前，大多數的國家還是過得去的，但是有幾個國家可能會遭遇到相當大的問題。

問題四：中國現在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第三大股東，到底中國在這兩個機構中扮演着什麼角色？因為，這兩個機構作出的決定都不是通過投票決定的，到底中國希望在這兩個機構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呢？

答：你問的問題其實很有趣，也點到了很多重要的問題。很不幸，很多關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問題也帶到了美國國會上，有時是通過更多的妥協而不是投票來決定的；而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整個管理結構、管理層，的確是一個問題。至於中國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這兩個機構裏的話語權，當然是越來越多了。如果說兩個機構基本上通過妥協去做決定，美國肯定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佔主導的，世界銀行也基本上是美國和歐盟的天下。雖然近年來中國的經濟實力越來越強大，但它的地位問題並沒有得到根本的解決，祇是在這兩個機構中的發言權越來越大了。這兩個都是歷史悠久的機構，但在21世紀來說，它們在很多方面都過時了。它們的理想是，希望中國貢獻更多的錢，但別說太多的話。也就是說，他們既想要中國的錢，又不想讓中國說話；他們希望中國對貢獻的這些錢不要做任何實際的掌控。兩年前，第四屆“金磚國家領袖”峰會上提出動議，希望中國和其他“新興市場”國

家在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有更大的發言權。“金磚五國”（包括南非）現在的總收入，比發達國家20世紀40年代成立這兩個機構時要多得多。雖然這一切都需要更新，但是現有的這些機構包括其他一些國際機構本來應該做更多事情，包括怎樣處理世界氣候變暖等等問題；但是，現在這些機構的資金是一個大問題。因為，裏面佔主導的美國，還有歐洲，其實沒什麼錢；所以，這些機構沒有足夠的資金處理一些需要迫切處理的問題，比如說氣候變暖。我們都希望有一個環保的經濟、可持續的經濟，那亞洲肯定會佔有越來越重要的地位。因為，亞洲是一個世界最多儲蓄的地方，中國已經是世界最大的貿易國。但是，中國現在在這些機構裏的發言權並沒有跟它的經濟貢獻的增長成正比。由於這些遊戲規則當時是由美國、歐洲國家訂立的，如果現在要改寫這些規則，美國或歐洲國家肯定是不願意的；特別是美國，它與這方面的利益是密切相關的。所以，中國想改寫這些遊戲規則，要在這些機構有更大的聲音；但新規則一定不可以祇對中國有利，而應是對世界各國家都有利。希望中國想重新制定這些遊戲規則時，要使得大家都能得益。

問題五：現在很多人說生活艱難，在你的發言裏，你說經濟代表機會，公平代表機會。你可不可以再解釋一下，為什麼公平代表機會？

答：所謂的機會公平，就是一個孩子不管在什麼地方出生，他的父母是做什麼的，都應有充分機會去發揮他的潛力。但是，在美國，情況並不是這樣。如果你的父母受到過良好教育，如果你的父母富有，那你就有更多的機會獲得良好的教育，也可以住在一個更好的地方，可以去更好的學校；如果你有錢的話，更有可能被送到一個好的私立學校，得到好的教育，然後你會有錢去讀好的大學，然後一個更加好的學位使你可以得到更好的工作。現在美國的年輕人找工作是多麼的難啊，他們想要得到實習的機會都沒有，很多實習的機會是無薪的；還有，很多富有的父母不僅僅有有用的關係網，而且，就算他們的孩子實習時沒有薪水，他們也可以供養他們。在美國，我知道有的年輕人在學校是很用功的，學習成績很好，但還是找不到工作——他們不能夠去實習，不能夠使他們的履歷更加地亮麗。因為他們的父母沒有錢，結果他們向上流動的每一步都障礙重重。由於他們畢業以後不能夠負擔沒有薪水的實習，所以他們就去餐廳做侍應生，結果他們向上流動的機會就沒有了。有關的數據是相當令人沮喪的。在美國，一個富有家庭的年輕人，即使他們在學校的成績很差，但是他們的收入會比一個在學校成績很好的窮人家的孩子要高得多。也就是說，由於你家裏的父母很窮，哪怕你通過努力在學校取得好的成績，結果你的收入是不會增加的，還是沒有向上流動的機會。這是非常令人沮喪的。在美國，有四分之一的孩子是餓着肚子去上學的。如果他們餓着肚子去上學，就不可能集中精神，怎麼可能學習得好呢？很顯然，窮人家的孩子他們有更小的機會可以得到醫療保障服務，得不到足夠的食物。我們越來越可以理解得到，這個機會的不平等在孩子上幼稚園就開始了，在五歲以前就開始了。窮人家的孩子他們接觸語言的機會少很多，這直接影響了他們的認知，也就是說，在他們上幼稚園的時候、上學的時候，他們的認知已經比別人晚了，已經輸在起跑線上了。研究表明，學前教育非常重要，特別是在三歲的時候，他們得到的語言環境，對他們以後的認知、對他們的發展是十分重要的，而窮人家的孩子在這些方面都輸了。在美國紐約，那是一個階層分化很嚴重的地方，發起了這樣一種運動，就是籌款增加學前教育。我之所以強調機會的平等，就是想要找出一些不平等的源頭。我們不可能處理所有的不平等，但我們必須要找出不平等的一些源頭，因為這會真正改變我們的社會。孩子不能夠選擇自己的父母是事實，但作為社會，它可以打造一個平等的平臺，使每一個年輕人都有機會充分發揮他的潛能。這應當是我們追求的目標。